

文化 溯源

晁补之与《沈丘县学记》

倪胜章

县学，旧时供生员读书的学校。科举制度规定，童试录取后准入县学读书，以备参加高一级考试，谓之“进学”“入学”或“入泮”，士子称“庠生”“生员”，俗称“秀才”。沈丘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学校是北宋元丰七年（1084年）创办的沈丘县学，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作有《沈丘县学记》传世。

《沈丘县学记》写于北宋元祐二年（1087年）五月，刊行于晁补之的《鸡肋集》，清乾隆时被收录到《钦定四库全书》中。晁补之写《沈丘县学记》时，正在朝中任太学正、秘书省正字、校书郎职（掌管校勘典籍之事）。

晁补之，字无咎，号归来子，山东巨野人氏，进士出身，曾擢升吏部员外郎、礼部郎中、史馆编修、实录检讨等职，是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。晁补之工书画，能诗词，善属文，其散文语言凝练、流畅，风格近柳宗元。其诗学陶渊明。其词格调豪爽，语言清秀晓畅，近苏轼。苏轼称其“于文无所不能，博辩俊伟，绝人远甚”。晁补之在诗、文、词诸方面均有建树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五十四《鸡肋集》提要说：“今观其集，古文波澜壮阔，与苏氏父子相驰聚，诸体诗俱风骨高骞，一往遒迈，并驾于张、秦之间，亦未知孰为先后。”又卷一百九十八《晁无咎词》提要云：“其词神态高秀，与轼可肩随。”胡仔在《苕溪渔隐丛话前集》卷五十一中则特别提出：“余观《鸡肋集》，惟古乐府是共所长，辞格俊逸可喜。”晁补之除工诗词歌赋书画外，亦擅长记文。他的记体文颇富特色，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取得了较高成就。其记体文或用白描手法真实反映江南山水的奇姿异态，或在叙述亭台堂榭的建造经过时触目兴怀，抚今追昔之情，于再现泉山形胜之际，贯注人世沧桑之慨。晁补之的记体文以议论和思辨见长，叙议结合、文脉通畅、韵致高雅，其佳构名

篇脍炙人口，广为传颂。晁补之博学，仅记文体就有亭堂楼阁记、游记、图画记、杂记、斋记、学记等。《钦定四库全书》收录晁补之学记计6篇，除《沈丘县学记》外，还有《林虑县学记》《祁州新修学记》《清平县新修孔子庙记》《冠氏县新修学记》《博州高唐县学记》等。

晁补之写《沈丘县学记》应该与张耒（字文潜，号柯山）有关。二人都是苏东坡的门徒，与秦观、黄庭坚并称苏门四学士，晁补之与张耒文风相近，志趣相投，博洽虚心，过从甚密，世人称“晁张”，有黄庭坚《晁张和答秦观五言予亦次韵》诗为证。当时，张耒的哥哥张柔（字文刚）在沈丘当县令。《张耒集》卷五十六《与陈三书》：“仆到陈十日，私干颇已办，只俟一见沈丘家兄，遂赴亳，当在暮春之初。”说明张耒常来沈丘看望张柔，晁补之随张耒来沈也是常事。晁补之在沈丘被张柔勤政办学、发展地方教育的业绩所感动，于是有了这篇颂扬知县办学的《沈丘县学记》问世。张耒是亳州人，亳州离沈丘很近。张耒的名字与其出生时事有关。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（卷四）：“张文潜生而有文，在其手曰‘耒’，故以为名，而字文潜。”张耒体格魁梧而肥胖，说话口吃，长相富态，人称“肥张”“肥仙”。黄庭坚《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》（之七）曰：“张子耽酒语蹇吃，闻道颍州又陈州。形模弥勒一布袋，文字江河万古流。”说明张耒不但肥胖、口吃，还爱饮酒，喝酒能从颍州一路喝到陈州。《宋史·列传第二百三》记载张耒“弱冠第进士，历临淮主簿、寿安尉、咸平县丞。入为太学录，范纯仁以馆阁荐试，迁秘书省正字、著作佐郎、秘书丞、著作郎、史馆检讨”，为北宋时期大臣、文学家，人称“宛丘先生”“张右史”。张耒仕途多舛，曾被指为元祐党人，数遭贬谪，曾任颍州知州。晚居

陈州（张耒的母亲是陈州人，张耒的外祖父李宗易为天禧年间进士，曾任著作佐郎、谯县知县），常游走于周边各县。

“霜雾沈远星，芳林语春鸟。客眸带余睡，马力健清晓。凝烟披草际，初日动林表。心随和风快，兴与飞云杳。芬菲帐已晚，夏阴生桑枣。慷慨一据鞍，此怀殊未了。”这是张耒一次去往沈丘的路上作的一首咏景诗，题目是《沈丘道中》。这两位苏轼门下的弟子，被苏轼称为“晁补之无咎、张耒文潜之流，皆世未之知，而轼独先知”。晁补之、张耒二位旷世文豪，常相聚于沈丘，吟诗作赋，谈古论今，一个为沈丘作记，一个为沈丘题诗，说明沈丘古时也是一处文人雅士会聚之地。

宋代右文，士人普遍崇尚儒学，读书求学蔚然成风，校舍的兴建也是方兴未艾、如火如荼，各地都广办学校，大力兴学，“虽荒服郡县必有学”，于是学记创作也就应运而生并渐趋兴盛。晁补之作有多篇学记，这些学记内容上并不单单记叙学堂的修建过程，更多的是抒发对办学之人品德操行的赞美及寄寓作者个人的思想，希望社会能广修学堂，大行教化，使得民风敦厚、国运升平。

《沈丘县学记》的开头部分论述了不同的人对为学的态度。其次记述知县张柔兴学育才、勤于吏治的功绩，张柔以有教无类的治学态度，“位无贵贱，皆可以行志；民无古今，皆可以道理”，以学试之沈丘，用三年时间使民有改，“而士亦欣然，相与化之”。中间部分描述了县学的建筑规模。最后是晁补之对沈丘县学的评价，以及办学的意义及影响。整篇记文叙议结合，议论宏博，词章粲然，体现了晁补之浓厚的民本思想，为沈丘教育史留下了浓墨的一笔。

沈丘县学记

民可以诚化，而不可以文治。吏功可以岁月致，而不可以一朝成。古者继世，以立诸侯，又命之教，而为学使，各以其身，化于其国。然中材之君，意竭于有为，而先王之事业，旷时而不睹。况夫后世吏，不得久于其官，而庠序之教已微。吏有爱民不苟之心，不幸或不得为而去，或虽为之，名具而实亡，以其鹵莽灭裂，仅存之余，而施之其久坏。不安之俗，故为其事而无其功。豪杰远识之士，以谓是区区，何益于为民而不为中材，乍存乍亡？而不肖者，尽弃不省；而好更张喜事者，乃始务修。此以盗名于众人不为之中，则学之存否，于吏治之损益，信未有系也。盖如卓茂、鲁恭其治，至使民相仁爱，不犯有司，而亦不闻其朝夕，与民诵诗、读书、舞乐、释菜，常常从事于此，而惟其诚心实事，则固有以得之。然俗吏至，或一切簿书、狱讼、赋税，无爱民之意。士亦不本乡党、庠序，而游侠四方，专以干禄于此。以为文不足为，或不得久而不为，则至于俗隳弛已甚，本又不立，孰从而维之？

谯郡张柔文刚，好学而有文，为令沈丘。尝曰：“位无贵贱，皆可以行志；民无古今，皆可以道理。”齐也，则欲以其学，试之沈丘。使民于衣食，必以时教；民于相牧养，必以孝弟。廉耻三年，而民有改。文刚喜曰：“吾所知信，是吾民可与言矣。”乃从其邑子，

论古之学者，所以治心修身，非干禄之意。而士亦欣然，相与化之，乃建学孔子庙。中貌象堂，室东西，序之房，与祭器、廩庖，皆有所。盖为屋四十楹，可以待乡先生之讲道而来子弟之愿游者。属补之记，补之曰：“世之所患，先王之事业不可为。非先王之事业不可为，而其势不得为。治天下有本而徒于其末教之，则智不胜；无以为之大而仅为之小，则力不足。虽然导民之道，唯其所欲，无不可成民。尝见者则识之，尝为者则能之耳。目习熟于此而中心不喻人情，无有也。文刚于是能知其本，则其所施、设宜有先后，非特以备观美人为亦为而已。武城弦歌，夫子戏之曰：‘割鸡焉用牛刀。’然亦各以教其人，使知道，则子游之意，卒乎为是。以为不告朔而餽羊，可遂去，则夫子之所悼也。民常病诈，而至其化上之所为，则甚信晋之俭、秦之好车马、卫之音、宛丘之婆娑以诗书。所记行四方，察其风俗，无不近者，当其一时上之所为，岂自知能入人如此之深耶？其渐靡使然。朝鲜去箕子千载，至汉时，其民饮食，犹以藟豆，民不相犯。耻淫僻其后，吏及贾人往者，稍侵之，俗乃益衰。朝鲜夷貊，况中国哉？后之来者，尝无忘文刚所欲为，则沈丘之民，虽使世世知好学，俗纯厚易治，无不可也。”

元祐二年五月十日 晁补之记
(赵海利点校)